

五四乡土文学的启蒙观念与乡贤叙事

余荣虎

内容提要 五四乡土文学是在新旧观念激烈交锋的历史场域中产生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坚定地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价值准绳,进行各自的乡土叙事,由此决定了五四乡土文学中两类乡贤形象。旧乡贤承载了儒家文化的理想,但亦难脱陈腐之气;新乡贤虽然有理想,有追求,但还嫌稚嫩。两类乡贤在乡土社会均不多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治理的种种乱象,而且使人们转向宗教寻求心灵慰藉。

关键词 五四乡土文学 乡贤 启蒙观念

余荣虎,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211171

晚清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一方面,政局动荡,兵连祸结,民生维艰;另一方面,纲常瓦解,西潮东渐。至五四时期,即1910—1920年代,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观念对旧伦理旧道德进行了全面而猛烈的抨击。五四新文学的作者们大都将艺术视角伸向各自的故乡,书写他们的乡愁,其中既有对故乡的思念,但更主要的是启蒙书写,即以现代观念作为参照,批判故乡的蒙昧与落后,呼唤把“人”从旧文化旧习俗中解放出来。

然而,启蒙视域是建立在民主和科学思想之上的现代价值,而其时乡土社会遵循的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传统价值,两种价值观对“人”的理解相距甚远。那么,在五四新文学作者的视域中,传统社会所倚重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乡贤是何面目?谁才是真正的乡贤?受政治及战争灾祸最为严重的乡土社会,到底存不存在乡贤?换言之,启蒙观念如何进行乡土叙事?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启蒙观念与鲁迅的乡绅批判

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先驱中,鲁迅是最坚定的启蒙者。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是鲁迅终身不渝的信仰。因而,在反传统的路上,鲁迅真正做到了勇敢决绝,义无反顾。在创作前期,鲁迅多将自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16ZDA192)阶段性成果。

己反传统的思想表现于小说文本之中,后期则以杂文为“匕首”和“投枪”,直接抨击一切倒向传统的言论和行为,可谓始终如一,至死不渝。在前期的小说创作中,鲁迅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艺术触觉,描绘出乡土社会种种“非现代性”“反现代性”的存在,引领了乡土小说的创作潮流,成为五四乡土文学的开山之祖。

鲁迅后来回顾自己的创作目的时说得很明白:“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启蒙主义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体现得特别鲜明,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彻底解构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可谓树大根深,影响深远,只有消解儒家文化以及因之而形成的风俗习惯的正当性,才能为“现代”踏出一条路来。

传统社会中,由于教育普及率低下,乡间百姓大多不懂礼法,教育民众、传播政令的责任就落实到乡绅头上,即所谓“皇权不下县”。乡绅因之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非官非民,但上通各级官员,下达寻常百姓,对乡土社会的正常运转以及礼俗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封建王朝对之多有倚重,还专门规定了给予乡绅的种种特权和礼遇^[2]。乡绅中品德、能力杰出者即为乡贤。至晚清及民初,乡贤确实依然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群体,儒家的基本思想培养、塑造了乡贤的文化人格,但恰恰是乡贤所信奉的儒家文化,决定了他们在五四乡土文学中的隐退。

正如有学者所言:“儒家整个学问可以说是一套‘成德之学’或‘内圣之学’。所谓成德、内圣或是为己,所指的都是把道德实践及德性的培养作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成圣成贤。”^[3]儒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致力于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但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并受现实种种羁绊的个人,能多大程度上践行儒家学说?这些活跃在乡间大地的儒生,真的“成圣成贤”了?在具有现代思想的鲁迅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鲁迅站在人性论的立场上,描绘了“成圣成贤”的虚妄。宋明以后,儒家特别强调对个人欲望的压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欲“成圣成贤”,就必须“灭人欲”,但鲁迅认为,人欲是无法灭掉的。《肥皂》里的四铭表面上道貌岸然,但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年轻女性身体的欲望。在四铭的教养中,这样的欲望是不该有的,因而有意压抑,被压抑的欲望进入潜意识,越发以另一种形式表露得人尽皆知。四铭太太说得直接:“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高老夫子》形神兼备地描绘了一个中老年男人高干亭被压抑的欲望。高干亭抱着去“看看女学生”的心思接受女校聘书,上课前,顾影自怜,课堂上,贪睹女生容貌,同时又生怕被女生看破,一听到台下有笑声就神经过敏。鲁迅以旧式读书人灭不掉的欲望,戳破儒家学说的神话,把士子描绘为或被欲望驱使,或压抑欲望的凡人。鲁迅从“人欲”这一点解构儒家文化,可谓正中要害。儒家文化强调对欲望的压抑,日益走向极端,严重违背人的本性,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现代的人学观,捍卫人的权力,正视人的欲求。

不仅限于“人欲”方面,在鲁迅笔下,传统士子在道德品行上也乏善可陈。《孔乙己》中的丁举人因孔乙己在自己家小偷小摸,竟然将他打折了腿,导致谋生乏术的落魄书生孔乙己走向穷途末路;《离婚》中的慰老爷和七大人以势压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专横刻薄、贪婪自私;《风波》中的赵七爷小肚鸡肠、幸灾乐祸;《长明灯》中的四爷贪婪阴险。如此等等,鲁迅以犀利的文笔刻画了这些活跃在乡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以下引用鲁迅著作,均出自同一版本)。

[2]参阅岑大利:《中国历代乡绅史话》,沈阳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6页。

[3]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7页。

士社会的士子的种种不堪,其中,既有对自私人性的洞察,也有对传统、对儒家文化的嘲弄和批判。而《祝福》则从整体上揶揄、讽刺儒家学说。小说先以鲁四老爷书房语出朱熹《论语集注》的对联一半脱落,一半仍在,隐喻士子与经典之间的精神联系已经松垮。后来,鲁四老爷的行为也证实了儒家文化并没有赋予他高于常人的精神境界,其冷酷自私反而甚于常人。

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历史语境中,鲁迅没有别的选择。选择现代,就必然会抨击传统,换言之,抨击传统是为了更坚决地选择现代。在第一本杂文集的后记中,鲁迅说得明白:“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1]因此,尽管鲁迅的思想、行为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鲁迅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一直保持批判的姿态。鲁迅决绝的反传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鲁迅的叙事立场与基调,对其后的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五四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匮乏。

二、旧乡贤的模糊身影与新乡贤的初露锋芒

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形成创作潮流,与鲁迅系列乡土小说的启发与示范有直接关系,不用说追随鲁迅、与鲁迅有交往的青年作家,就连与鲁迅较为疏远的沈从文也承认受其影响:“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传奇》,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2]鲁迅乡土小说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可归因于精湛的艺术技巧、富有感染力的白话语体,但更重要的则是小说所传达的现代理念,换言之,鲁迅乡土小说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契合为那些被时代唤醒的青年指引了一条“感时忧国”的道路,于是,乡土小说创作蔚然成风。

虽然在五四青年作家的眼里,乡贤是与没落的社会与陈旧的文化连在一起的,属于落后、乃至反动的人物,但这些作家大多是抱着“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他们比鲁迅的乡土经验更为丰富,对乡贤有更多的了解与接触,因而在他们的笔下,多多少少留下了乡贤们的真实身影。虽然很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但乡贤偶尔出场,亦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道德境界和影响力。作为儒家文化培养的理想人格,旧乡贤为五四作者所关注的主要品格有以下三点。

其一,讲礼仪,具有仁爱思想,富有正义感。彭家煌的《今昔》《怂恿》、鲁彦《阿长贼骨头》可为代表。《今昔》讲的是1916—1926年中国社会沧桑巨变中,湖南东北部农民的遭遇。十年前,即1916年,军阀混战殃及无辜农民,他们受“清乡委员”的敲诈、刑讯与杀戮;十年后,农民运动中牛贩子出身的农协委员,借下乡之机敲诈私自酿酒的两个农民。小说以今昔对比的方式,书写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相同的被压迫、被鱼肉的命运;同时,也描绘了农民始终不绝的反抗——委员今昔易人,身份亦不同,但都遭掌掴,颜面丧尽。特别是十年前,芝大王爷痛打清乡委员,可谓理直气壮。其实,芝大王爷与清乡委员并无私人矛盾,只是委员多次对士绅无礼,“见了绅士不起身,不脱眼镜”,被芝大王爷一拳打碎了眼镜,“脸上当场挂了彩”。从身份上看,芝大王爷做过一任知府,又是候补道,属于士绅,其责打傲慢官员的行为,深得民心,传为美谈,谓之乡贤,不为过誉。芝大王爷捍卫的是士绅的面子,讲的是儒家的礼仪,故而,委员也无可奈何。村民对芝大王爷壮举的传颂,既含有对官员倨傲不恭的不满,也有对

[1]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2页。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礼仪文化的认同。有学者指出,“(自汉代始)儒教大传统确实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1],当为确论。《怂恿》讲的是湖南乡间老实人被利用、被捉弄的闹剧。闹剧的幕后操纵者是劣绅牛七,其中夹杂了两个家族的明争暗斗。耐人寻味的是,牛七的哥哥四爷,“在清朝算得个半边举人”,对牛七的播弄是非不以为然,特别珍重生命。牛七教唆老实的政屏以妻子吊要挟对方,但四爷说:“如果二娘子有个什么,就是裕丰倾了家,政屏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对头裕丰老板的二哥雪河在省城“教过多年洋学堂的书”,与县官交情匪浅,“为人刚直,发起脾气来,连年尊派大的活祖宗也骂的”,但却没有参与这场闹剧。四爷、雪河这样的士子,虽非完人,但明辨是非,知人爱人,也算得上乡贤。《阿长贼骨头》中,阿长偷盗成性,骚扰妇女,挑拨离间,却百般抵赖,无耻至极。村中最有权威的判事深波先生,当众对阿长说:“河盖并没有盖着!”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做人,跳河去吧!”深波先生所言从正面支持了众人对阿长的谴责,显示了乡贤的正义感。

其二,为人正派,颇具声望。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描绘的是,五四时期具有现代意识的爱国青年倪焕之从推行新式教育到投身社会改革的失败旅程。故事的重心是江南小镇上旧劣绅蒋士镗对新乡贤蒋冰如的教育改革的暗算、阻扰。外号蒋老虎的蒋士镗身上集中了传统文化的阴暗面:贪婪、奸诈、投机、钻营。脆弱而充满希望的新事物、新事业就是被这样的旧势力所破坏。一部《倪焕之》就是新与旧的斗争。然而,叶圣陶并没有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以“闲笔”引出与蒋老虎不一样的旧式士子赵举人。赵举人先后三次出场。第一次是在茶馆里,作者介绍赵举人是“有头等资望的老辈”,在蒋老虎胡诌学校准备用来办农场的荒地是他家的时候,赵举人据实说:“记得那块地方向来是荒地。”并劝说蒋老虎不要跟蒋冰如打官司。第二次是金佩璋的哥哥树伯请他充当倪焕之、金佩璋的证婚人,身为教师的树伯认为“论齿论德,都只有他配”。这两次出场都突现了赵举人的良好人品和声誉。最后一次是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镇上,赵举人喜不自胜,在茶馆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言论。三次出场完整地刻画了一个正派、温和、爱国的旧乡贤形象。谓之“闲笔”是因为小说的主旨是描绘具有民主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遭受各种旧势力、旧思想的束缚、困扰与打击,而赵举人的言行与此无关,甚至有所抵牾,因为作为旧势力中的一员,赵举人对新人新事并未阻挠。作者之所以精心刻画赵举人这一旧乡贤形象,就是真实地描绘当时江南小镇人文风习的全貌,《倪焕之》在真实性方面的成就,夏丏尊早就指出来了:“十余年来中国的教育界的状况,乡村都会的情形,家庭的风波,革命前后的动摇,遂如实在纸上现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跃有生气。”^[2]江南小镇真实的情形乃是,旧式士子中既有蒋老虎之流的劣绅,也有赵举人一类的乡贤。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中,描绘了一个蒙昧、落后的村庄,但村中也不乏乡贤,“现在有两个秀才都还活着。有两家人家请着先生在教子弟。象林元,虽已改了业做了医生,但他笔墨的好是人人知道的,他从前也是一个童生。年青的象进安,村中有什么信札都是他代看代写。评理讲事有丹生。募捐倡议有芝亭。此外还尽有识字能文的人。”在宽泛的意义上,秀才、医生等这些“识文断字”的人,都属于乡贤,他们都能得到村民的信服,承担地方的文化教育与公共事务。

其三,心地善良,宽厚,世故。台静农的《天二哥》中的吴六先生,在天二哥无理取闹、用硕大的身体压住小柿子痛打的时候,“有些不忍,用力将天二爷拉开”,从而将可怜的小柿子解救出来,而此时众人对天二哥一片喝彩、阿谀之声不断,两相对照,越发凸显了吴六先生的善良。许杰的《隐匿》中,彩珠的舅舅江峰是“剪了辫的上等人”,但在处理彩珠因丈夫外出多年而与人私通致孕一事时,丝毫不见道学家的迂腐与冷酷,他把彩珠藏在自家楼上待产,出面与彩珠突然归来的丈夫周旋。在江峰身上,体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2]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叶圣陶文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现了乡贤的宽厚仁慈。论文化程度,鲁彦的《许是不至于罢》中的财主王阿虞算不上乡贤,但论经济实力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又属于乡贤一流的人物。王财主平时为众人调解纠纷,不惜以钱财结交四邻,但疑遭强盗打劫之时,王财主敲锣报警,却无一人出手相助。第二天,许多人假惺惺地前来慰问,王财主却圆滑地与之周旋,不肯怠慢、得罪任何人,王财主的世故只是为了与众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虽然五四乡土小说中的旧乡贤在品格上有受到肯定的一面,但作者毕竟是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评价旧人物,在他们笔下,旧乡贤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陈腐、没落的气息。例如《倪焕之》中的赵举人,作为证婚人,以为当众演说粗俗,改为以朗诵八股文的腔调,摇头晃脑、神气十足地诵读长篇祝词,令众人不知所云,忍俊不禁,完全是一个过时的旧人物。《怂恿》中的四爷、雪河都略显自私和狭隘。而在更多的小说中,旧乡贤作为次要人物,出场机会少,性格单一,被描绘得更为深入的是新乡贤。

新乡贤是指生活在农村或小镇上的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新乡贤有理想,有追求,属于乡土社会的“新人”。在五四乡土文学中,新乡贤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不成熟的“新人”,他们出现在叶圣陶笔下的江南小镇。从1912年中学毕业初为小学教师,到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前后十一年中,有八年多的时间,叶圣陶在苏州附近担任小学教师。因为熟悉当地的新旧知识分子,对当时苏州近郊小镇的风土人情有深入的了解,因而,他能传神地描绘赵举人一类的旧乡贤,也能形象地描绘蒋冰如(《倪焕之》)一类的新乡贤。叶圣陶在《校长》《搭班子》《倪焕之》等小说中,塑造了性格相似的小学校长形象。作者不是将视点单一地限定于校园或教育,而是在小镇多重的、复杂的关系网中,塑造他们的性格,因此,他们的命运是与小镇连在一起的。与其说他们的烦恼是小镇上的校长的烦恼,毋宁说是小镇上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新乡贤的烦恼。他们坚信民主与科学,对教育充满热情,为人正派,家境富裕,在他们身上显示了新乡贤所特有的理想和热情,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但新乡贤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当他们试图以新的观念进行改革之时,或受邪恶势力的钳制,或受人情的束缚,或受劣绅的掣肘,空有一腔热血,最终都遭受挫败。新乡贤的挫败既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原因,而叶圣陶对新乡贤自身弱点的刻画相当深入。他们人品可靠却缺乏应对复杂人事关系的策略,有改革之心却缺乏果敢的行动力,属于不成熟的“新人”。

第二类是初露峥嵘的新乡贤。柔石的长篇小说《二月》中芙蓉镇上的中学创办人、校长陶慕侃即属此类。论及《二月》中的人物,论者多注重萧涧秋、陶岚,而忽略陶慕侃,事实上,陶慕侃也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他不仅连结着萧涧秋、陶岚、钱正兴等性格、志趣各异的新知识分子,同时,也要处理开风气之先的学校与落后的小镇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以教育立身的新乡贤,陶慕侃与叶圣陶笔下的小学校长所面对的情形是相似的,即新与旧的冲突,但陶慕侃比蒋冰如更善于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在知识信仰上,他属于新知识分子,因而,能包容陶岚的任性,接受萧涧秋的出格,容忍钱正兴的庸俗自私;而在世务上,他却善于与旧势力周旋,使他执掌的中学在保守落后的环境中平稳运行。在作者看来,陶慕侃还“新”得不彻底,可称之为“中庸的校长先生”^[1],但正是在“中庸”的外表下,陶慕侃保护、扶持了新的事物,同时,他自己也得到乡土社会的认可,成为少数具有较强务实能力的新乡贤。

第三类是被旧时代吞噬的新乡贤。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和柔石的《旧时代之死》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这类新乡贤形象。《一个危险的人物》中的子平,家产有二十几亩田,几千元现款,接受新式教育,担任过大学教师,算得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者没有明确交代子平突然回乡的目的,但暗示与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有关。不管子平是否是共产党员,但对共产主义理论是认同的,因此,子平回乡是想解救故乡的百姓,但恰恰是最底层的农民充当了杀死子平的最有力的帮凶。子平从衣着到行为都

[1]柔石:《二月》,上海书店1929年版,第51页。

是新的,诸如,外衣不扣扣子,与男女同事、学生合影,在卧室穿睡衣,不吃落在桌上的饭粒,林中爬树,溪中洗澡,月下练剑,因这些不同于旧式士子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竟被村民视为“恶魔”,正是他们联合起来在其贪婪而狠毒的叔叔惠明先生面前,指称其为“共产党”,才引发了惠明贪占财产、变相谋杀的恶行。可是,在最后关头,作者依然让阿武娣、史法之类最底层的庸众自觉地看住子平,并为荷枪实弹的士兵带路,使之殒命于本有机会逃出的山中。子平之死,有人性的贪婪之故,但更重要的是子平作为新派知识分子与旧伦理旧习俗之间的尖锐对立,儒家文化教条式地渗入了村民的意识中,形成顽固、狭隘、鄙陋却自以为是的观念、习惯与风俗,加上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共同谋杀了乡土社会中稚嫩的新人。《旧时代之死》讲述青年大学生朱胜瑀贫病交加,极度苦闷、失望,在同村好友李子清的护送下,回到离上海不太远的故乡。可是,无意之中引得未婚妻自杀身亡,朱胜瑀悔恨、自谴,并亦自尽。朱胜瑀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尽管沾染了五四落潮后的悲观、颓废情绪,但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属于新乡贤。跟多数新乡贤一样,朱胜瑀没有改变乡土社会,反而迅速被其吞噬。朱胜瑀之死的直接原因是由未婚妻自杀而产生的愧疚,而深层原因是新旧婚恋观的冲突以及旧伦理、旧习俗可怕的“吃人”力量。两篇小说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旧时代。旧时代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无论是关于知识分子行为举止的观念,还是婚姻观,都足以毁灭子平、朱胜瑀这样脆弱的新人。

上述三类新乡贤都带有“新人”的弱点,但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乡土社会新人形象长幅画卷中最早的一批新人。在他们身上不仅承载了乡土社会的希望,也体现了时代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对后来左翼小说中的革命新人形象、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人形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乡贤缺位的后果:乡村治理乱象与转向宗教

前文我们初步爬梳了五四乡土文学中新旧乡贤形象的类型与性格特征,但综观五四乡土文学,乡贤形象可谓匮乏,只有叶圣陶、鲁彦、彭家煌、柔石、台静农等少数作家塑造了乡贤形象,更多的作家,如鲁迅、胡也频、许钦文、许杰、蹇先艾、废名、沈从文等笔下,均未出现新旧乡贤(沈从文后来描绘过旧乡贤);而叶圣陶等人,也仅在为数极少的创作中描绘了乡贤。总体而言,五四乡土文学作者对当时乡土社会的认识基本一致,他们认为更多的乡间上层人士贪婪、自私、暴戾,缺乏贤者应有的仁心和公心。

由于乡贤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实际的领导者,乡贤缺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治理的种种乱象,各类矛盾迅速激化,特别是宗族矛盾和乡间上下层之间的矛盾。

这里所说的宗族矛盾,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发生在村落之间的族群矛盾,但它往往会升级为宗族矛盾。许杰的《惨雾》中,环溪村和玉湖庄为了一块荒地的开垦权,先是两村中几个人私下打斗,继而玉湖庄一人被对方偷袭丧生,进而两村正式械斗,最后双方宗族介入,演变成惊心动魄的正式的阵地战。玉湖庄是两族聚居,各以一个“文人”为首——春舟和肖峰。作为“文人”,两人都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内心并不想挑动大规模的械斗,春舟说“叫警察”,肖峰想请人“正式的讲和”,但他们两人都缺乏旧乡贤一言九鼎、力排众议的威望和胆识,从而使事态一步步恶化。胡也频的《械斗》描述的是浏村和濮村因一桩强奸案而引发大规模械斗,数十人毙命。最初,浏村村长也想“讲理”,但对方不但不认错,反而出言不逊,并将前去交涉者的指头砍掉了。没有乡贤,因而不能公平、合理地处理生活中的偶发事件,最终任其演化成族群矛盾,并埋下了宗族矛盾的种子。两篇小说都描绘了普通村民的愚昧盲目、冲动好斗,离开了乡贤的引导,小小的事件都可能引发村落、宗族之间不共戴天之仇。

乡间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在五四乡土文学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如地主残暴逼租。叶圣陶的《晓行》、台静农的《人彘》《井》等小说中,欠租者都是老实善良之人,且事出有因,但地主毫无人性,租户或死里逃生,或家破人亡。次如恃强凌弱。鲁彦的《最后的胜利》、许杰的《七十六岁的幸福》、

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等小说描绘地方上层人士或小有财产者,任意欺凌弱者,毫无怜悯之心。再如上层的淫乱。台静农的《负伤者》中,张二爷强占人妻;彭家煌的《节妇》中,祖孙三代先后把丫鬟出身的阿银作为玩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为非作歹的乡间上层人士往往与警察署长、低级军官等基层官方人员相互勾结,或本身即为公职人员。百姓真正惧怕的是他们背后的官方势力。因此,乡土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官民矛盾,这一矛盾在1930年代上升为尖锐的阶级矛盾。

乡贤缺位不仅使乡村陷入矛盾重重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乡民失去精神信仰。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的乡镇,乡贤是人们的精神领袖,有学者在总结士绅必备的种种条件之后,总结为“建立起一种威望和崇高的地位,受人尊敬被人信服”^[1]。少有甚至没有可以尊敬、信服的人,必然引发信仰危机。而这一缺憾并非是在风调雨顺的太平日子里发生的,其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乡民们面临肉身存续的种种苦难,如置身于落后的文化与习俗之苦^[2],遭受贫穷与败落之苦^[3],经历兵灾之苦^[4],以及饱受道德沦丧之苦^[5]。如此困境中,精神需要更为迫切。转向宗教,寻找精神依赖就是必然的。

有学者指出,“宗教之真正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的依赖感。”^[6]精神依赖在本质上是肉身生存遭受压力所催生的心灵和情感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在宗教中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向迷信或神话。鲁迅在《祝福》中深入地描绘了这一现象。祥林嫂两度丧夫、独子丧生、饱受歧视,在人间找不到温暖,因而想在阴间重逢死去的亲人。如果没有关于死后阎王会将其锯开分给两个丈夫的顾忌,祥林嫂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死去,然而,作者偏偏让祥林嫂听信了这个传说,在恐惧与期待中死去。小说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启蒙立场:迷信并不能为像祥林嫂那样生无可恋的妇女带来幸福,重要的是用行动改变世界,寻找新的生活,如作者在《故乡》中说的:“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较之于迷信,宗教的力量更大。如果有机会,祥林嫂们当然乐意成为教徒,因为入教,就能在一个更系统、更庞大的精神体系中得到慰藉。台静农的《为彼祈求》中的陈四哥即是如此。陈四哥少失双亲,幼年行乞,被人收养却受尽虐待,后来逃出主人家,因勤劳和善,有所积蓄,买妻成家,不久又遇水灾,逃荒途中妻子染病而死,半生辛劳,却落得一无所有。此时,他遇到了天主教,牧师收留了他,并待他很好,陈四哥因此生活得很幸福。小说前面的大量铺陈其实是在说明陈四哥信奉天主教的原因,而教堂和牧师确实为之提供了生存之所,同时,也使之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小说中的牧师、教堂都以正面形象出现,显然,作者对陈四哥皈依天主教是赞同的。小说开篇即描写了村民信教的盛况:“村里做礼拜的非常的多。……可以看见大路上的老人,少妇,青年的姑娘们,从容地往教堂走去。”台静农笔下的乡民或受权势者欺凌,或自身愚昧而蛮横,或遭兵祸,尽是世间不幸人,少见如此平和、从容的景象,其中包涵了作者对生活于道德失范境遇中的农民走向宗教的理解与认同。甚至可以说,是作者有意开出一剂药方。这种意图在柔石的《旧时之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旧时之死》中的朱胜瑀回故乡后,住进妙相庵中养病,本是为了清净,但在听尼姑讲述自己的不幸经历以及对于生命的理解之后,一扫满腔的郁闷与悲伤:

他听完了她的话以后,他决定,他要在今夜完全忏悔他的过去,而且也要在今夜从她的

[1]史靖:《绅权的本质》,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58页。

[2]鲁迅的《祝福》、许杰的《惨雾》《台下的喜剧》《大白纸》、许钦文的《疯妇》《老泪》、叶圣陶的《遗腹子》、废名的《浣衣母》等中短篇小说都涉及这一问题。

[3]如鲁迅的《故乡》、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胡也频的《毁灭》、台静农的《蚯蚓们》、许钦文的《石宕》、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等。

[4]如胡也频的《一个村子》《四星期》、台静农的《新坟》、叶圣陶《火灾》等。

[5]如胡也频的《活珠子》《傻子》、彭家煌的《节妇》等。

[6][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手里,讨了一条新生的路。这时,他想象他自己是一个婴儿,他几乎要将他过去的全部的罪恶的秘密,都向她告诉出来。^[1]

因受佛力感化,朱胜瑀将尼姑认作“精神的母亲”,似乎获得了新生。在大都市,朱胜瑀经受金钱的压迫、疾病的折磨与情欲的煎熬,失望而归;而在家里,又受母爱的束缚,亦难长留,只有在妙相庵,朱胜瑀才放下了所有的怨恨,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耐人寻味的是,朱胜瑀不是蒙昧的庸人,而是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最后在宗教中寻找慰藉,甚而找到“精神的母亲”。作者是否真的以为宗教能拯救朱胜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作者让朱胜瑀无意间犯下致命的错误,并因之勇气尽失,了断残生。

鲁迅、台静农、柔石等人不仅描绘了处于动荡现实中的弱小者心灵世界对宗教(或迷信、传说)的迫切需要,而且写出了这一需要的“合理性”,但其中又包含了作者的无奈与悲哀。虽然鲁迅对佛学有很深的研究,并且化用佛家的修行方式,好用佛家语,但现代思想才是鲁迅的精神底蕴,因此,他把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的日子称之为“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2]。既然认为佛教只能引人逃避现实,自我麻痹,自然会更加排斥迷信,为何鲁迅在《祝福》中对祥林嫂的迷信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不止祥林嫂,作者对《故乡》中闰土挑去香炉和烛台,同样表示理解。此中寄寓了作者对道德崩溃、时无贤者的乱世中的弱者的同情,只有迷信能给予他们安慰,尽管这种安慰是虚幻的。

从鲁迅到台静农、柔石,可谓一脉相承。台静农、柔石都不主张以天主教徒、佛教徒的态度,应对现实的苦难与不平,但他们最终还是认为,当现实中没有可以信赖的贤者、心灵没有可以信服的人物之时,宗教必然承担替代性的功能,故而,他们小说中牧师和尼姑都不失贤者的风采,向苦难、迷茫中的弱者伸出了救赎之手。有学者认为,“佛教教义繁复,宗派林立,但无论何宗何派,其理论的根本旨归都在于教导芸芸众生认识世间苦以及求得根本解脱这世间苦的妙法途径。所以,哪一个时代给予人们的苦难特别深重,哪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就特别容易与佛接近。”^[3]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如此,越是处于苦难中的人,越是容易与之接近。因而,五四时期,不乏为乡民开出宗教“药方”的作者,另如许地山和废名。面对苦难深重的民众,他们或显或隐地企图以宗教对抗外在侵扰。五四时期的苦难可谓多矣,但乡土之上,信仰坍塌,物欲横流,缺乏乡贤,是最大的苦难之一。

乡贤之“贤”在于其言行符合某种文化关于人的能力、品格的最高理想。古代社会的乡贤践行的是儒家文化,现代中国推崇的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现代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必然导致评价标准的不同,因而,五四作家视域中的旧乡贤可谓寥若星辰。有意思的是,现代作家眼中的新乡贤,如《一个危险的人物》中的子平,在村民眼里,简直无异于妖魔鬼怪。如此看来,每一种文化都会培养出自己的乡贤,并且不同文化之间难以“对话”。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另一个事实,五四时期正值社会转型,局部战争不断,政局朝夕变化,“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只能默默忍受各种灾难,此时,要他们恪守儒家文化的信条成为贤者,终非易事。而新乡贤由于年龄、资历、观念等原因,还难以对乡土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五四乡土文学中乡贤稀少,既有价值观、评价标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本身的原因。

[责任编辑:平 啸]

[1]柔石:《旧时代之死》,《柔石小说全集》(上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页。

[3]谭桂林:《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北京]《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